



FADS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FADS, Vol. 1, No. 1, 2026, pp.63-77.

Print ISSN: 3107-1805; Online ISSN: 3107-181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ad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ADS.26.01.05lrcgs>



语言、种族与资本主义

——美国“流散民族认同”与“主权国家认同”的悖论谱系

王韵秋 (Wang Yunqiu)

摘要：美国认同的结构性悖论不仅在于“主权国家认同”与“流散民族认同”的表层对立，更在于优势族群同样处于一种被遮蔽的流散状态——其主权身份恰恰建立在压抑自身流散性的基础之上。本文从文化政治学视角出发，梳理了这一悖论在美利坚历史中的四重谱系：建国时期，“英式流散身份”与“美式主权身份”发生错位，盎格鲁裔通过语言标准化将流散焦虑转化为对底层的规训；19 世纪，在优生学与进化论的加持下，“流散种族认同”被科学优势论剥夺了主权平等权；20 世纪，垄断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将语言商品化，制造了“亚流散群体”向上流动的幻象与“主流散群体”固化等级的张力；步入 21 世纪，“主流散群体”因经济与文化上的“双重流散”焦虑爆发，走向极端的排他性民族主义。这一谱系表明，语言、种族与资本主义的合谋不仅制造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还揭示了边缘族裔的“生存焦虑”与主流群体的“防御性焦虑”在人类心理结构上的深刻同构。流散因此不再专属被压迫者，而是缠绕着压迫者的隐蔽权力机制。

关键词：流散民族认同；主权国家认同；语言；种族资本主义；亚流散群体；防御性焦虑

作者简介：王韵秋（通讯作者），女，江苏太仓人，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外国文学与跨学科，电子邮箱：yunqiuwang1983@163.com。

Title: Language, Race, and Capitalism: A Genealogical Study of the Paradox of ‘Diasporic Ethno-Identity’ and ‘Sovereign State-Identity’ in the U.S.

Received: 05 Mar 2026/ Revised: 13 Mar 2026 / Accepted: 16 Mar 2026 /Published online: 15 Jun 2026 /Print published: 30 June 2026

Abstract: The structural paradox of American identity lies not merely in the superficial opposition between “sovereign state-identity” and “diasporic ethno-identity,” but fundamentally in the fact that the dominant ethnic group itself inhabits a concealed state of diaspora—its sovereign identity is predicated precisely on the repression of its own diasporic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olitics, this article traces a fourfold genealogy of this paradox in American history: first, in the founding era, the dislocation between “English diasporic identity” and “American sovereign identity,” where Anglo-Saxons transformed their diasporic anxiety into the disciplining of subalterns through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second, in the 19th century, under the aegis of eugenics and evolutionary theory, “diasporic ethno-identity” was stripped of sovereign equality by a discourse of scientific superiority; third, in the 20th century,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neoliberalism commodified language, creating a tension between the illusion of upward mobility for “subordinate diasporic groups” and the hierarchical consolidation by “superordinate diasporic groups”; and fourth,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double diaspora” anxiety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 the superordinate group triggered an explosive, exclusionary nationalism. This genealogy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llusion of language, race, and capitalism not only manufactures unequal social structures but also reveals a profound structural isomorphism in human psychology between the “existential anxiety” of marginalized ethnicities and the “defensive anxiety” of dominant groups. Consequently, diaspora is no longer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oppressed; it is a latent mechanism of power that entangles the oppressors themselves.

Keywords: Diasporic ethno-identity; Sovereign State-Identity; language; racial capitalism; subordinate diasporic groups; defensive anxiety

Author Biography: Wang Yunqiu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E-mail: yunqiuwang1983@163.com.

引言

语言的同一性是最早用来划分族群的要素。20 世纪初期的“语言转向”塑造了全新的认识世界方式，它既是主权民族国家“统一认同”的基础，也是流散民族“自我认同”的话语实践，更是统一国家内不同流散群体的话语博弈。全球现代化背景之下，主权国家与流散民族之间的张力也日渐突出。前者要求各民族对主权国家进行统一的政治心理认同，而后者却是流散民族在主权国家中对其母国文化传统的认同（Hall, 2019, p. 107）。这便意味着政治与文化、民族与种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矛盾，也力证了认同不仅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群体产生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弗洛伊德, 1998, p. 86），而是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流变中，主权政治与流散文化之间的互动模型。不过，多数西方学者依旧未能看到在一个种族资本主义为本体的民族国家中，鉴于其本质上的梯度性与等

级制，即便是流散民族内部也存在着“主流散群体”与“亚流散群体”之家的重大区别。在文化学上，通常将处于权力高位，掌握文化资本的称之为主流文化，而将那些处于边缘地位，却饱受主流文化压抑的称之为亚文化。文化政治学上的模式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国家认同与流散认同之间的模式，也同样可以用来指涉流散群体自身的政治文化划分，而在语言文化的透镜下，以英语语言文化为主的（欧裔）群体被置于主流散群体的位置，而亚非拉等流散群体根据其对英语语言文化的熟练度又可被划分为“次流散群体”或“亚流散群体”。由此可见，流散群体并不能被视为一个光滑、平等的文化整体，而是内在充满异质与阶级化的文化模型。在全球化盛期建立的美利坚共同体极致演绎了国家主权认同与流散文化认同、主流散群体认同与亚流散群体认同的层级割裂。这种身份割裂并非呈现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上，而是植根于“语言认同-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之中。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亨廷顿对欧美民族认同要素的溯源：语言、种族、资本主义并不是单一存在的，也不是两两结合的，而是三者协同并进，甚至勾连起一整套社会运作规则。美利坚正是在制造劳动分层、资源掠夺、身份排斥、秩序固化的同时，暴露出“主权认同”与“流散认同”之间的深刻裂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也将进一步揭露美利坚“流散认同”在“亚流散群体”与“主流散群体”内部的“梯度性”，为流散研究提供深层透视。

一、政治经济传统与语言民族主义

——建国时期“英式流散身份”与“美式主权身份”的悖论

尽管美利坚民族的确立是一个相当晚近的事件，但就其文化渊源来说却是一个与殖民史、流散史息息相关的问题。这段殖民史也奠定了美利坚殖民身份的盎格鲁性，更定义了其内在的流散性。当第一批殖民者从“帝国”流散至广袤的北美大陆上时，他们的心理认同仍然归属于“帝国”。他们将自己视为来自英国的“旅居者”，而非“流散者”（Brah, 1996, p. 179）。但是同时，他们又深受母国的歧视，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心理上，这种裂痕都不断加深。随着矛盾的加剧，北美殖民地人民开始思考自己独立的民族身份。不过，心理身份与民族身份并不是始终一致的，后者特指经济与政治上独立的主权身份，而前者指的是对原生群体的历史文化认同。就此而言，早期殖民者在情感上的心理体验是“流散”的（Brah, 1996, p. 179），这种心理认同也就与“帝国身份”发生了冲突。

需要注意的是，情感的联系不仅仅依赖于一个政治实体的塑型，更需要由语言、文化、习惯、历史等人文要素作为基础。其中，语言“传达了对现实的建构与塑造，并反映了社会意义、理解、观点和身份”（Dingley, 2020, p. 412）。因此，解决“流散身份认同”与“主权身份认同”之悖论的关键就被委任于语言。

不过，更重要的是，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治理工具，更是一种经济占有工具。这一点在北美殖民者的母国——英国那里已有先例。17 世纪的英国已经逐渐脱离王权统治，走向宪政。这一时期占据意识形态高位的是资本主义。因此，语言也成为资本的一种间接形式，而让各个群体掌握一

种语言则不仅能够有力推动资本的流动，更能使不同族群文化在经济上认同于资本主义文化，从而在更广泛的交流与沟通之中获利。因此，随着英国启蒙主义的兴起以及天启信仰的衰微，由神权主导的拉丁语逐渐让渡于由君权所主导的英格兰语，而在资本主义兴盛的条件下，这种语言又因意识形态上的世俗性成为能够代表市民社会的语言，并进一步作为一种贸易输出语言在殖民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经济效用。

对于北美殖民者来说，英语的认同是他们保持“帝国优势认同”的一种方式，而这种优势又是经由英语语言文化沉淀的阶级、种族优势。因此，他们在文化上延续了英语，却又在众多文化政策中尤为积极地推行新的语言政策。其中，书面化的盎格鲁语言又是重中之重（Foot, 1996, p. 29）。因为任何一种语言在从口语转向书面语时都会改变其性质，它必须在语法、拼写、词汇表和发音上进行标准化，它的词汇范围必须被扩展，以满足新的需求（Hobsbawn, 1996, p. 1072）。对美国建国初期来说，在语言效用上，书写式的盎格鲁语言相较于结构松散、表述随意的族裔化口头语言更加精确，也更加符合殖民地法制体系的要求，更能有效地消除不同族裔口语的差异，从而形成一种认同感（Joseph, 2007, p. 46）。这也相当于在获得独立主权身份的同时，通过复刻英语语言文化的不平等关系，在新建的主权结构中重新嵌入了这种“等级主义”。换言之，书面语言政策可以一方面服务于他们对其他少数族裔施行规训，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他们祛除自身的“流散感”，重新获得优势。

但相较于政治身份的统一，早期建国者更迫切的是经济问题，因为美利坚民族国家的独立恰恰是要从英国重商主义体制中脱离，在经济上制造一个以自由经济体制为主体的，更加“优势”的资本主义帝国。这一点在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的想关著述中，已经被充分说明。在这种逻辑下，推行盎格鲁书写语言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在其经济效应。事实上，早期资本主义植根于印刷业，而恰恰是英语文献的大规模流通催生了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产业。以安德森的观点来看，北美殖民地的印刷资本业为了追求利润，出版了大量文献，一方面，由于印刷物的文字效应压缩了空间，从而使得远在他乡的英裔移民仍旧能够通过书写语言感到自己与旧大陆之间存在着文明联系，另一方面，印刷制品又重新塑造了一种具有共同归属感的“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 2006, p. 78）。这种心理上的“悖谬式”需求又反过来推动了出版业与印刷业发展，为资本主义赢得大量利润，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一个新的主权政治中以新的形式崛起的助推剂。

18 世纪开始，欧洲民族运动如火如荼，语言作为一种天然的文化符号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个时候，美利坚以英语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目标在于对外输出一种标准化语言，从而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维系其优势位置，对内则推行一种梯度化的语言统治，从而在“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中稳固盎格鲁种族的主权地位。1775-1871 年间，尽管有不少多元民族主义政策颁布，但在欧洲语言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控制北美国家的主要民族因素仍旧是“盎格鲁-撒克逊气质的”（Stuart, 1988, pp. xii）。因此，尽管在政治认知范畴内，他们将一部分情感投入到一种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上，但是，在语言认知范畴内，他们则将其余的情感投射于一种以帝国语言

为“遗传优越性原则”（Anderson, 2006, p. 150）的语言民族主义。这也就造成了美利坚身份认同上的第一道裂痕，即尽管实现了一种主权统治，但美式主权国家认同的塑型却是建立在相对于英国的流散民族认同之上。不过，随着主权国家身份的加强以及奴隶制的历史推进，早期的这种英式流散身份认同及相应的焦虑最终被转移到了主权国家结构的“底层”，即那些被奴役的亚非拉流散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被转移至结构“底层”的流散性，并未在盎格鲁裔的集体无意识中彻底消失，而是转化为一种深层的“防御性焦虑”。早期殖民者从“帝国”被剥离的生存焦虑，经过独立战争的置换，内化为对新生主权国家边界脆弱性的恐惧。为了掩盖这种被压抑的流散性，他们必须通过语言同化和制度规训，不断向内确认自身的绝对中心地位，并将任何非盎格鲁文化的存在视为对这一脆弱主权的威胁，从而表现出对多元文化持久且非理性的排斥。由此跟进的也是语言与资本主义在另一历史阶段的另一层逻辑。

二、种族主义、优势论与语言的本土化

——19世纪“流散种族认同”与“主权民族认同”的悖论

独立战争爆发的前几年，美利坚共同体对自己的身份界定从“英帝国领土范围”开始转向了“自由帝国”（Johnson, 2006, p. 99）。不过，正如福柯所言：17世纪往后的战争历史话语在表面上是国家的，但在隐性机制上却是种族的（福柯，1999, p. 239），因此，“自由帝国”实际上的主权政治并非是各种族的，而是盎格鲁单一民族的。结合语言视野来看，美利坚共同体的语言文化认同在复刻了英裔白人“优势心理认同”的同时，更复刻了这个社会心理机制背后隐含着的社会关系。这不仅推动了早期“平等性”政治想象转向了资本主义的“梯度性”现实，也反映了美利坚共同体“社会平等原则和日常系统性歧视之间的紧张关系”（Gaertner, 2005, p. 617）。在此基础上，原先北美殖民者产生的“流散感”也转移到了被大规模作为劳动力而奴役的亚非拉流散群体身上。

相比合法移民问题的滞后，19世纪美利坚共同体的政治经济问题也是流散居民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约有1000万至2000万非洲人被贩卖至美洲（Arthur, 2008, p. 1）。1807年之后，美国停止了奴隶贸易，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南方奴隶仍旧发挥着核心作用。彼时的棉花是全球迫切需要的大宗商品，它带动了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工厂。因此，奴隶制对美国来说是一笔很好的生意和投资。然而，随着工业时代的全面来临，美国经济规模日渐庞大且不断增长，它对经济类别的依赖也不再是奴隶制，因此，南方奴隶主的领土也必然面临着被新经济模式征用的命运。内战之后，美国从宪法上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各州颁布的禁令、法案却将这些刚刚被归入公民的黑人流散群体驱逐至社会最底层，从南方来到北方工厂的黑人也迅速成为新的被剥削群体。如此一来，一方面，黑人流散群体脱离了奴隶的身份，拥有了“自由人”与“公民”的民族国家身份，但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他们却被排除在美利坚民族国家自由、平等的宪法原则之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自由与奴役、平等与等级、国家与民族之间，这些黑人流散群体的心理在确立自身身份

的同时亦经历了认同的分裂(Wright, 2001, p. 199)。也就是说, 即便“流散民族”获得了主权身份, 也无法真正像“主权民族”那样与主权国家产生“优势”认同, 而仅仅是“劣势”认同。

从上不难看出, 19 世纪的美利坚共同体在身份认同上具有“流散种族身份”与主权国家身份之间的不一致。不过, 更需注意的是经济问题的介入。尽管资本主义在新大陆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与前资本主义的战争、资源危机、社会冲突割裂”(Robinson, 1983, p. 9), 因此, 基于经济目的, 美利坚民族国家的认同方式也无法与盎格鲁白人民族国家割裂。这种经济身份也侧面导致了主权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肯定了“英国人、新教徒、白种人以及来自北欧的人种才是真正的美国”(穆勒, 2008, p. 31)。但如果说, 建国时期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在身份上从“帝国流散者”转向“自由帝国的主权者”, 那么可以说, 19 世纪的重心在于如何在民族与国家的身份同一性中保持盎格鲁裔的优越心理与优势社会地位。

进一步论之, 美利坚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心理动力不再是 18 世纪主权、领土等政治优势论, 而是 19 世纪优生学、进化论等新兴知识带来的科学优势论。史密斯(1981)认为, “从英国到新大陆的空间变迁不仅意味着一种史诗般的旅行, 更意味着致力于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种生活方式中, 为个人自由和进步提供的机会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优越”(Smith, 1981, p. 230)。事实上, 当美国革命者拒绝英国的专制主义时, 他们并不否定欧洲文明的进步。更重要的是, 他们从启蒙评论家那里得到了这样一种“科学”意见: “英国政权是文明世界中最自由、最繁荣和最进步的”(Onuf, 2011, p. 18)。因此, 一方面, 他们反对与英国在政治主权上混为一谈, 试图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 另一方面, 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后, 他们又在科学主义的知识结构中与伦理文明产生了进步论上的心理认同。例如, 当时的社会决定论就预设了社会现实决定人的生物属性, “如果不平等, 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必须被排除在外。显然, 黑人并不平等。因此, 他被排除在外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Smith, 1981, p. 235)。当“现实就是合理”的社会逻辑与科学进步主义联合在一起, 19 世纪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就转而成为了民族生物学, 即优势民族的表达方式。然而, 如果英语被赋予了一定的民族优越性, 那么在所有主权领土上使用这种语言的“非我族类”则会被隐秘地擢升为“与我同族”。这符合美利坚的国家意识形态, 但却不符合内部民族(尤指盎格鲁裔)的社会心理机制, 即优势心理。

无疑, 英语是美利坚与英国历史渊源的遗产, 这种语言民族主义又使得他们遵从于盎格鲁-撒克逊部分的行为和态度规范(Smith, 1981, p. 232)。这便反向引起了他们内在的“主权国家身份”与“英帝国身份”的矛盾, 并在社会与个体层面潜伏了身份断裂的危机。因此, 从文化自主性层面来看, 美国的英语必须在保持文化历史属性的基础之上生产符合新民族国家的语言。最早在美国提出“民族国家语言方案”的是第二任总统约翰·史密斯。他为了解决多民族矛盾, 主张在文化、教育、行政等各个体系推行一种修正过的英语。这种英语要在语用上能够与历史产生联系, 又要有其不同于英语的特点。史密斯总统的政策也推动了一批语言学家从语音、语调、语义、甚至句法上对英语的“美国化”。但这一政策让英语明显偏离了盎格鲁语用规范(蔡永良, 2007, p. 107), 比

如在拼写上, defence (英) 被拼写为 defense (美), metre (英) 被拼写为 meter (美), realise (英) 被拼写为 realize (美)。事实上, 从“新英格兰”到“美利坚”的名称变换本身, 就是一次掩蔽流散性的身份重写: 对欧洲母国而言, 他们是流散者; 对美洲大陆而言, 他们则强行置换为主权者。这种身份的翻转越是彻底, 他们就越需要将自身的流散感向外投射。英语的“美国化”不仅是为了建立统一的政治实体, 更是为了在心理层面上斩断与母国的流散羁绊, 通过语言符号的篡改来宣告一种虚幻的、无根的主权起源。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面性: 一方面, 借助语言的功能学原理可以巩固一个新兴政权, 从而塑造一个统一对外的政治实体 (例如, 彼时的新领土只有在英语占多数, 并通过普通法后才能被承认为是美国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借助语言的人类学原理可以区分不同的阶级、身份、地位, 从而建构一种对内的社会差异。一项有关标准英语的语法社会学调查可以进一步说明: 如果来自密歇根、新英格兰和阿肯色州的母语使用者避免使用社会污名化的语法结构, 如双重否定结构 “They didn’ t do nothing” (他们什么也不做)、主谓不一致模式 “They’ s ok” (它们还好), 他们就算有不同的口音, 也会被视为标准英语的使用者。反之, 他们将被贴上 “种族” 的标签 (Milroy, 2000, p. 58)。结合上述两个例子来看, 英语语言不仅仅是可以塑造爱国热情的民族主义机制, 更可以成为制造种族主义的核心。尤其是从后者层面来看, 这实际上恰好符合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 换言之, 表面上, 语言将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类因素整合成一个连贯的、自觉的整体, 因而是塑造主权国家 “统一” 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但当它用来作为标记原生情感归属时, 却能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让一个国家整体中的优势种族占据优势经济。这也尤其表现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全球化加速发展时期的美利坚民族认同之上。

三、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与语言的经济学原理

——20 世纪 “亚流散民族认同” 与 “主流散国家认同” 的悖论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 美国的人口、资源、国土、经济、科技都获得了大幅度提升。大批欧洲、非洲、墨西哥、犹太移民涌入美国。20 世纪伊始, 移民人数大幅度增加, 截止到 2000 年, 移民人口已经达到 9095417 人 (Daniels, 2004, p. 224)。有学者就此指出: 美国这种多元文化混杂的事实擘画了这样一幅 “美国梦” 愿景, 即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密集的社会互动, 旧的种族忠诚会融化, 并改革成一个新的、同质的社会” (Hornsey, 2000, p. 145)。不过, 也有学者指出, 尽管 20 世纪的美国对流散群体采取了更多包容政策, 但一些同化策略反而使得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将他们视为二等公民的文化观念 (这其中包括他们自己), 这种基于文化的心理身份认同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在一个主权政体内的地位、收入、分配、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权利。可以说, 在 “刻意支持包容性原则” 的背后, 隐藏着一种 “相对柔和” 的 “排他性国家认同” (Devos, 2014, p. 750)。

事实上, 有资料表示, 在 “流散群体” 中, 实际被接受为拥有主权国家合法公民的依旧多是欧洲人 (Arthur, 2008, p. 2), 换言之, 即便是流散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合法与非法、欧洲与亚非拉、男

性与女性等不同身份的区分。这也说明了流散群体可以按照这种社会、文化、性别，甚至宗教信仰上的不同被分为更为细致的“主流散群体”与“亚流散群体”。上述学者提到的“隐蔽的排他性”具体来说也并非是对“主流散群体”而言，而是“主流散群体”对“亚流散群体”在语言、价值观与制度层面的主导作用。

不过，这种通过语言表现的排他性政策并非仅仅是文化认同的，因为政策的颁布往往与社会现实处境紧密相连，而并非是一种心理抚慰。事实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法、德、美等民族国家纷纷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要想获得高额利润就要对外扩张，需要“以过剩资本在国外进行投资或贷款为形式直接和间接地争夺世界市场”，而如此一来，“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就成为这场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结果。”（应世昌，1994，p. 20）因此，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结构转型，一方面开始在人口政策上施以手段。对于美国来说，工业社会经济增长需要流动的人力资本，汇率估值和移民流动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政府制定移民政策的方式，换言之，包容性的政策与排他性政策是以经济学为基本原理的（Shin, 2021, p. 3）。这也意味着“种族/民族问题是在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内嵌于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异中的社会边界，移民种族与民族性是国有财富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Painter, 2016, p. 149）。然而，对于移民政策的颁布又是根据移民国以及移民社会身份来决定的，这样才能迎合垄断资本主义的市场需要。近来的学界基本认同，主权国家的主流语言对于流散群体来说，是与个人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劳动力市场等经济要素紧密相连的（Chiswick, 1995, p. 247）。1917年的移民法曾经将年满16岁以上不识字的外国人遣返回国，但却留下了美国自身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熟练工人。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美国对智力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移民政策中则有了对文化、知识的更高要求。

20世纪初，语言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是一种重要的知识文化资源；在垄断资本主义语境下则是“一种可以交换经济利润的东西”（Shina, 2016, p. 443-452）；而在语言、民族与经济的三联关系中，却是“一种抽象而透明的沟通媒介，可以促进人类资本价值平稳地在民族语言学边界上进行转移”（Shina, 2016, p. 445）。甚至有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调查显示，在财富占比方面，非英语母语的移民面临财富劣势，与那些英语熟练者与英语拙劣者相比，他们之间的经济差可以浮动在6186到19306美元之间不等（Painter, 2016, p. 164）。还有调查说明，英语可以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由此间接影响国家财富，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可能会影响工资差异（Plaesu, 2010, p. 296）。

历史地来看，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将英语进一步强化为主权认同的方式，试图以此一方面解决由于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带来的文化异质性问题，以便构建一个具有共同政治身份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在国家民族的政治身份框架下对主流散群体、亚流散群体施行层层经济剥削，以便维持美利坚政治实体的等级特质。一项语言计量学方面的研究指出，在语言掌握上，“亚流散群体”因为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对语言的适应度不佳，而那些本身母语就是主导语言，或者长期以来已经融入主流社会的“主流散群体”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数据表明，语言熟练度与收入成正比关系

(Chiswick, 1995, p. 252)。另一个例子是 20 世纪后半叶的教育法案。为调和语言文化与政治身份的冲突, 美国 1968 年颁发了《双语教育法》。然而,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 这种温和的调和方案又因为政治气候变迁遭到了抵制。1994 年颁布的法律使英语成为评估学生进步的一部分 (Gorter, 2017, p. 233)。可见, 尽管表面上使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语言是目前美国教育界的趋势, 但就英语的“霸权地位” (Gast, 2017, p. 116) 而言, 双语的使用与教育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即用来缓解“流散民族” (尤其是亚流散群体) 与“主权民族”之间因经济分化带来的剧烈冲突, 并进一步在主流散群体与亚流散群体之间进行梯度性剥削。在这一过程中, 语言成为了区分散等级的核心度量衡。当“亚流散群体”将英语视为向上流动的工具时, 他们同时也在无意识层面内化了盎格鲁流散群体的文化等级秩序。在此逻辑下, “主流散群体”曾经的历史流散性被彻底洗白, 以“优势文化资本”的形式被自然化、合法化; 而“亚流散群体”的流散性则被逆向标记为“语言障碍”和经济劣势。流散的创伤属性被巧妙地置换为阶级与种族的劣势标签, 从而维护了主权认同的排他性纯洁。

20 世纪后半叶, 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经济生产模式逐渐枯竭, 传统现代工业引发的能源、生态与经济方面的危机越来越显著。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矛盾, 里根政府引入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准备通过无限放大个人利益、减少国家调控, 达到一种系统性、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这种普遍体系必然是“美国价值”的。在福利国家收缩和风险加剧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 美国“大民族主义”抬头。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扩大了“主权国家认同”, 希望借此补偿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中被削弱的主权, 但它又是新自由主义秩序本身的构成元素, 在没有后者的情况下, 无法发挥自身作用 (Joppke, 2021, p. 965)。因此, 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与新自由主义是双向互动却又是相互背离的制动体系。

对新自由主义来说, “主权国家身份”是一种具有功利性质的“获得性”公民身份, 它排斥歧视性的种族分类, 但这种排除只存在于个人层面, 即考虑个人做什么, 而不是她/他是什么。因此, 接近政治概念的“种族”可以被替换为接近文化心理概念的“流散”。而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会在其他形式上划分不同的等级, 如主流散群体与亚流散群体。其中, 认知文化在规训“亚流散群体”的作用上尤为重要。在认知文化要求方面, “语言和公民知识测试则是一个普遍标准” (Joppke, 2021, p. 970)。直到 1970 年, 美国的移民政策中仍有一项规定: 要想获得正式公民身份, 移民必须通过英语考试 (Hobsbawn, 1996, p. 1069)。进一步来说, 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语言行使的是“一种由其意识形态特征所支持的社会政治功能 (Dunmire, 2019, p. 6)。但对于以经济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来说, 语言更是“一种商品化技巧, 一个被纳入人力资本发展项目的方式” (Shina, 2016, p. 445)。

新自由主义话语维持了英语的文化意识形态, 也掩盖了一个事实: “个人的努力和成功对于寻求经济安全或社会流动的当代美国来说是重要和必要的, 但这却依旧远远不够。” (Warriner, 2016, p. 506) 一项对美国西部成人 ESL 项目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的调查分析显示: “新自

由主义评估制度可能无法提供学习者实际需要的技能。相反，因为受到重视个人主义和精英统治的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文本和谈话都限制了成年（亚）流散英语学习群体的身份认同想象”（Warriner, 2016, p. 498）。可见，新自由主义一方面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创造了一个依靠努力与技艺来获取“政治主权身份”的认知系统，另一方面，又通过语言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细密分层来排除“主流散群体”与“亚流散群体”。正是通过这种认同悖论的策略，新自由主义甚至扭转了那些“亚流散群体”的认同逻辑，即如果他们不“成功”，那是由于缺乏动力或努力工作，而不是什么其他原因，因为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已经提供给他们足够的机遇。

四、后种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与语言的差异化

——迈向 21 世纪美利坚共同体的身份悖论

步入 21 世纪，新自由主义不但没有退潮，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服务于阶级主义与种族主义，但是其对个体主义、个人奋斗以及经济利益的崇尚也使得一部分工人阶级英裔白人在社会处境中不断下沉。这导致美国的英裔白人（尤其是“主流散群体”）在潜意识中形成一种受害者心理，他们也因此将问题归咎于“亚流散群体”，从而鼓励了暗潮汹涌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Brunello, 2021, p. 24）。深入探究可知，21 世纪美国“主流散群体”的焦虑本质上是“双重流散”的叠加爆发。一是经济流散——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部分底层白人群体被资本的跨国流动甩出安全区，遭遇了实质性的阶级剥夺；二是文化流散——“亚流散群体”人口比例的持续增长，使得盎格鲁文化在公共空间逐渐“去中心化”。当他们建国以来被刻意压抑的历史流散性与当下新产生的经济、文化流散性相叠加时，其潜意识中的“防御性焦虑”便达到了临界点，最终转化为极端的排他性民族主义与“白人至上”的政治狂热。

与此同时，由于 20 世纪的移民政策，21 世纪的“主流散群体”人口占比开始下降，而“亚流散群体”人口比例持续增长。权威数据显示：21 世纪初以来，亚洲（印度、中国、菲律宾）移民成为增长最快的群体。2022 年，约有 1060 万居住在美国的移民出生于墨西哥，占美国所有移民总数的 23%。其余分布于印度（6%）、中国（5%）、菲律宾（4%）及萨尔瓦多（3%）（Moslimani, 2024）。这一方面说明 21 世纪的美国呈现出流散群体增长的状态，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一个流散群体的整体内部，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也呈现出不同的“亚文化”差异，并进一步区分出了“亚流散群体”。

为了避免身份认同撕裂而导致的国家分裂，美国政府加强了对美国公民的语言文化认知培养。2001 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规定“英语专业能力有限的学生必须达到与英语学生相同的英语水平，并在所有领域达到相同的学术标准。与此同时，还需测量年度进展，并需要全州范围内的标准化测试”（Gorter, 2017, p. 233）。在这一政策的施行下，双语课程的数量大大减少，大多数双语“英语学习者”必须以英语为目标。这表面上是一个语言政策，却无异于再度将盎格鲁文化视为唯一的民族国家认同标志。

9·11 事件之后,美国因受恐怖主义的威胁而进入“强烈的国家认同、不确定性和情绪主义时期”(Li Q., & M. B. Brewer, 2004, p. 729),这时的民族主义概念也比任何一个时期强调“毫无疑问的忠诚和假定的阶级优越感”(Bush, 2003, p. 210)。在民族主义回潮的背景下,美国出于国防需要于 2006 年发布了“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计划”在语言教育中加入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小语种的学习,但这种多元语言教育背后却是国防战略与英裔沙文主义的接驳。因为,尽管美国政府未曾强制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但州政府却可以出台相关政策。以亚利桑那州为例,2006 年,第 103 号提案就将英语指定为亚利桑那州的官方语言(Ullman, 2012, p. 459)。这种“阴阳语言政策”在其他州也并不少见。这也能够说明,在美国的政体之中,双语法案、多语政策的相继施行并不意味着美国从实质性层面采取了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主义,而是意味着“种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排他群体”。

2008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验证了语言文化认知背后的种族主义矛盾。在奥巴马当选后,有研究显示,这不但没有说明种族主义的消亡,相反,奥巴马所受的国民身份质疑却说明了主权国家身份与种族主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联系紧密,只不过它的手段与形式发生了改变,如通过语言、人种、出生地的区分重构了美国于 19 世纪确立起来的统治模式,并进一步维护了那些处于统治阶级的白人地位(Devos, 2014, p. 214-226)。在后一层面,也有案例明示,奥巴马时代的语言政策尤其支持“美国非裔英语”(AAE)的使用,因为使用这种语言能巧妙融合主流群体与非裔流散群体两种文化模式,并进一步为这两种表达形式赋予合法性。不过,问题是,AAE 的使用是与标准英语形成对比的。有埃博尼克语支持者(Ebonics 是 AAE 的狭义提法,包含非洲流散黑人的语言传统,更具有流散认同意味)就认为,对于 AAE 的保护与支持反而会将其纳入“标准英语矫正”的行列,并不利于主流群体对流散群体文化独立的认同(Flores, 2015, p. 163)。

2016 年以来,特朗普右翼政府的(大)民族主义回潮,更是为本来就浮动在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种族主义推波助澜。尽管不少学者将这一现象归咎为“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以及白人经济地位的逐年下降,但从深层次来看,由于资本主义在逻辑上依赖于种族主义(Go, 2021, p. 43),因此本次的民族主义回潮不过是美国资本主义转型的再一次表现。更需要注意的是,从特朗普“美国优先”“白人至上”“遣返移民”等政策之中可以看出,美国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中的“大民族主义者”具有明显的“梯度性”特质:“主权民族-流散民族-亚流散民族”已经成为特朗普时期的基本认同秩序。

2020 年的拜耳政府登台后,民族主义叙事和议程继续蓬勃发展(Soborski, 2021, p. 138)。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和排他行为,从而使民众更难信服他们真的“合众为一”。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美国为了捍卫国际霸权地位彻底单方面脱离全球事务(Mario, 2021, p. 486),而英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英语语言国家也借机呈现出与美国的联动趋势。这一跨区域话语整合背后的动力不仅仅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利益,更是语言文化在历史与民族上的统一性。就此,一些学者指出,

“美利坚-盎格鲁身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基于共享群体内的依恋”，把自己视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公民，与流散群体共享主权身份，另一方面，又在语言、种族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处产生了一种“基于本质主义优越形式的群体骄傲”（Li Q., & M. B. Brewer, 2004, p. 730），这种本质主义让他们更容易跨越国家边界，在语言、文化以及经济的历史中寻找共同的“优势身份”，而不仅仅是在国内与“亚流散群体”共享“普遍身份”。

2024 年，特朗普再次胜选，获胜之后的特朗普宣布沿用关税、驱逐非法移民、维护传统性别与白人群体等一系列保守主义措施。这也意味着，美国将在政治与经济上更加保守。同样，这也不仅仅预示着，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裂将愈加严重，更预示了民族、自由、平等的理念将与社会现实再度割裂。事实上，在“流散身份”与“主权身份”的悖谬被拉至极限的 21 世纪，美国的“排他主义”不仅根深蒂固，更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即不再只是通过强制的“文化同化”来实行，而是通过“扩大差异”而实现。有学者调查指出，首届特朗普政府曾经在亚利桑那州等非英语母语占大多数的地方推行过英语与母语并进的語言教育政策，但他最为支持的仍是英语语言教育（任显楷等，2018, pp. 62-78）。虽然，语言多样化表面上体现出美国“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但却不可忽略，在一个以政治保守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冲突严重的国度，社会多样性也会成为用来放大差异的工具。

结语

语言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文化，更是这个民族的社会秩序、地位以及认知的结构底色。作为这一结构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也随之暴露出来。纵观美利坚的历史进程，其身份认同的悖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为一种层层递进、自我繁衍的“悖论语系”。

在建国时期，悖论体现为“英式流散者”与“美式主权者”的身份错位，语言成为了转移焦虑的工具；到了 19 世纪，悖论演化为“科学优势论”与“流散种族劣等论”的共谋，语言成为了制造种族隔离的标尺；进入 20 世纪，悖论转化为新自由主义语境下“亚流散群体”的向上流动幻象与“主流散群体”的梯度剥削，语言沦为了被商品化的人力资本；而迈向 21 世纪，悖论最终走向反噬——当“主流散群体”在全球化中被抛入“双重流散”的现实处境时，其历史上长期被压抑的流散焦虑与当下的阶级焦虑叠加，最终以极端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形式爆发。在这个语系中，美国的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主权群体”对“流散群体”的排他，更是“主流散群体”对“亚流散群体”的二次规训；但这绝不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性瑕疵，而是语言、资本与权力相互咬合的系统性症候。

流散不仅是边缘者的生存方式，也是中心者的隐蔽姿态。在国家主权与流散文化的张力中，优势族群的流散意识非但没有消失，反而经由制度、经济与文化的多重运作，转化为一种“压制他者流散性的权力”。这一发现，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流散研究的基本预设——流散不专属于被压迫者，它同样缠绕着压迫者；族裔群体流散的“生存焦虑”与主流群体反向流散的“防御性焦虑”，在人

类心理结构的深处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厘清这一悖论语系，不仅能为美利坚共同体的身份撕裂提供深层透视，更将为当下的流散研究与批判理论提供一种跨越权力位阶的全新范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史（13AWW005）的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Wang Yunqiu ^{ID} <https://orcid.org/0009-0009-2393-8556>

References

-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Press.
- Arthur, J. A. (2008).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Research in 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 Brah, A. (1996). *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Contesting Identities (Gender, Racism, Ethnicity Se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runello, A. R. (2021). "The Tragic Fall of Better Angels: Nationalism, Neoliber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Responsibility in American Conservatism." *World Affairs* (1): pp. 8-32.
- Bush, M. E. L. (2003). "American Identity and the Mechanisms of Everyday Whiteness."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 pp. 209-226.
- Chiswick, B. R., Miller & Paul W. (1995). "The Endogeneity between Language and Earnings: International Analys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 pp. 246-287.
- Daniels, R. (2004). "Immigration." in S. Whitfield (Ed.),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America* (pp. 213-232).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ing.
- Devos, T., & Mohamed, H. (2014). "Shades of American Identity: Implicit Relations between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8): pp.739-754.
- Dingley, J., & Catterall, P. (2020). "Language, Religion and Ethno-national Identity: the role of knowled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 pp. 410-429.
- Dunnire, P. L. (2019). "America's Most Precious Resource: The future in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Futures* (9): pp. 1-16.
- Flores, N., & Rosa, J (2015). "Undoing Appropriateness: Raciolinguistic Ideologies and Language Diversity in Educa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 pp. 149-171.
- Foot, S. (1996). "The Making of Angelcynn: English Identity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 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ixth Series* (6): pp. 25-49.

- Gaertner, S. L., & J. F. Dovidio. (2005).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Racism: From Aversive Racism to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 pp. 615-639.
- Gast, M. J., D. G. Okamoto and V. Feldman (2017). "We Only Speak English Here: English Dominance in Language Diverse, Immigrant After-School Program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 pp. 94-121.
- Go, J. (2021). "Three Tensions in the Theory of Racial Capitalism." *Sociological Theory* (1): pp.38-47.
- Gorter, D., & Cenoz, J. (2017).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Multilingual Assessment." *Language and Education* (3): pp. 231-248.
- Grant, S. M. (2019). "Toward a Topography of National Trauma: Mapping the Past onto the Future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 pp. 366-387.
- Hall, S., & Morley, D. (2019). *Essential Essays Volume 2, Identity and Diaspora*.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Hobsbawn, E. (1996). "Language,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Social Research* (4): pp. 1065-1080.
- Hornsey, M. J., & Hogg, M. A. (2000). "Assimilation and Diversity: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Subgroup Rel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 pp. 143-156.
- Johnson, R. (2006).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American History: A Companion of Colonial America*.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Joppke, C. (2021). "Nationalism in the Neoliberal Order: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4): pp. 960-975.
- Joseph, J. (2007). *Language and politic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i Q., & Brewer, M. B. (2004).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Identity After 9/11." *Political Psychology* (5): pp. 727-739.
- Mario, D. P. (2021). "Comparisons, Integration, COVID-19, and th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Diplomatic History* (3): pp. 480-488.
- Milroy, L. (2000).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wo Nations Divided by the Same Language (and Different Language Ideologies)."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 pp. 56-89.
- Moslimani, M., and Passel, J. S. (2024). "What the data says about immigrants in the U.S." *Short Reads* | September 27. (<https://www.pewresearch.org/?p=9484>)
- Onuf, P. S. (2011).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 : pp. 77-100.
- Painter, M. A., & Qian, Z. (2016). "Wealth Inequality Among Immigrants: Consistent Racial/Ethnic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 Res Policy Review* (2): pp. 147-175.
- Plaesu A. (2010). "The Mechanics of Immigrant Ethn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Law and Social Justice* (2): pp. 291-300.
- Robinson, C. (1983). *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 London: Zed Press.
- Smith, A. (1981). "National Images and National Maintenance: The Ascendancy of the Ethnic Idea in North America."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 pp. 227-257.
- Shin, A. J. (2021). "Exchange rates and immigration policy."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9): pp. 1-16.

- Shina, H., & J. S-Y Park. (2016). "Researching language and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5): pp. 443-452.
- Smith, A. (1970). "Metaphor and Nationality in North America."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3): pp. 247-275.
- Soborski, R. (2021). "Biopolitics in the Time of Pandemic: Popu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the Light of COVID-19."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1): pp. 137-150.
- Stuart, R. C. (1988). *United States Expansionism and British North America, 1775-1871*. Chapel Hill &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Ullman, C. (2012). "My Grain of Sand for Society: neoliberal freedom,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circulation of ideologies of national belong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4): pp. 453-470.
- Warriner, D. S. (2012). "Here, Without English, You Are Dead: ideologies of language and discourses of neoliberalism in adult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5): pp. 495-508.
- Wright, D. R. (2001). "African Americans." in William L. Barney (Ed.), *A Companion to 19th Century of America*.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蔡永良 (2007): 《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上海三联书店。
- [Cai, Yongliang (2007).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anguage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Press.]
- 弗洛伊德 (1998): 《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 车文博等编译。长春出版社。
- [Freud, Sigmund (1998).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reud, Vol. 4*, compiled & translated by Che Wenbo et al.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 凡瑞·穆勒 (2008): “经久不衰的种族民族主义”, 吕鲜林、臧珏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5): 31。
- [Müller, Verena (2008). "The Enduring Power of Ethnic Nationalism." translated by Lü Xianlin & Zang Jue. *Digest of Foreign Social Sciences* (5): p. 31.]
- 福柯 (1999): 《必须保卫社会》, 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Foucault, Michel (1999).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translated by Qian Han.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任显楷、陈喜润等 (2018): “美国的语言政策研究:奥巴马到特朗普时期美国的语言政策与实践的动态跟踪研究,” 《中美人文科学刊》(2): 62-78。
- [Ren, Xiankai, Chen, Xirun et al.(2018). "Research on U.S. Language Policy: A Dynamic Tracking Study of U.S. Language Policy and Practice from Obama to Trump." *Journal of Chinese-American Humanities* (2): pp. 62-78.]
- 肖建飞 (2009): “普世语言、王朝语言与民族语言——近代以来欧洲语言的政治化及其权威模式,” 《世界民族》(2): 1-13。
- [Xiao, Jianfei (2009). "Universal Language, Dynastic Language, and National Language: The Politicization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Their Authority Models in Modern Times." *World Ethno-National Studies* (2): pp. 1-13.]
- 应世昌 (1994): “美国的移民政策和国外移民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国别经济》(1): 18-20。
- [Ying, Shichang (1994). "U.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Role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U.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try Studies Economy* (1): pp. 18-20.]